

从《白雪公主》看后现代主义解构趋势

陈世丹

(厦门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后现代主义小说不仅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内部形态和结构,而且对小说这一形式和“叙述”本身进行反思、颠覆和解构。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巴塞尔姆的代表作《白雪公主》,以其非线性的叙述、嬉戏的形式,极端的幻想与日常的细节相结合等,鲜明地表现了这些解构特征。

关键词:小说形式与叙述;后现代主义;解构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00)02-0038-05

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一位文体冷峻,具有形而上学的反讽、沉思式的超然与对政治敏感的小说家。他对后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学批评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后现代作家的新一代之父。”^[1](P13)他的一些作品已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不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无一不反映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长篇小说《白雪公主》^[2]是巴塞尔姆的代表作,是对1918年发表的如今家喻户晓的格林童话《白雪公主》的戏仿。巴塞尔姆用后现代主义手法,即用松散的片断拼贴的手法再现了这个神话。虽然故事中的人物有些变形,动作经常被出乎意料地扭曲和中断,但小说还是完成了原童话的基本情节。

小说中现代的白雪公主,22岁,是个高个的黑发美人,身上长着许多美人痣,像童话中的白雪公主一样,“她的头发像乌木一样黑,她的肌肤像雪一样白”。她与七个侏儒男人生活在一起。这七个侏儒男人每天发着“嗨嗨”声到一家中国食品工厂装坛坛罐罐和洗刷楼房。但他们的头儿比尔却开始厌倦白雪公主。而白雪公主也厌倦“当家庭主妇”(同时暗示她与七个侏儒男人的性关系),盼望有一个王子来救她。故事中的简,是巫婆形象;保罗是白雪公主等待的王子形象。因嫉妒白雪公主的美丽,简编织了她的恶毒之网;与此同时,保罗挖了一个穴,建立了一套训狗计划,还用了一个自己发明的“远距离早期警报系统”监视白雪公主,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他观察并最终赢得她。最后,保罗自己吃了“毒苹果”——简准备给白雪公主喝的一杯有毒的伏特加吉布森酒。故事以白雪公主在保罗墓前撒花、再度贞节并升天结束。

然而,这样的概述却会造成严重的误读,因为巴塞尔姆的用意在于创造一个拼贴效果,将

收稿日期:1999-09-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规划项目: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主题与艺术手法论。(97CWW004)

作者简介:陈世丹(1959-),男,黑龙江佳木斯人,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博士生。

非线性的叙述、嬉戏式的形式以及极端的幻想与日常的细节相结合,从而传达出现代生活的反童话本质,它的空虚,它的千篇一律,它的庸俗无聊,人在其中的不可避免的失望和失败。

美国当代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在他的《后现代转折》(*The Postmodern Turn*)一书中,对边界消失呈拼盘式的后现代主义亦以拼盘式的归纳法将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归纳为11个方面。其中5个方面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deconstructive)趋势,6个方面是后现代主义的重构(reconstructive)趋势。[2](P258-259)本文拟依据哈桑、杰姆逊、利奥塔德和德里达等文论家的理论,结合对小说《白雪公主》的分析,集中讨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解构趋势。

解构趋势包括一系列否定、颠覆既定模式秩序的特征,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表征为:不确定性、零散性与无我性、无深度性、非原则性、卑琐性与不可表现性。

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根本特征之一。这一范畴具有多重衍生性含义,诸如:模糊性、间断性、异端、多元论、散漫性、反叛、曲解、变形。正是不确定性揭示出后现代精神品格。这是一种对一切秩序和构成的消解,它永远处在一种动荡的否定和怀疑之中。这种强大的自毁欲影响着政治实体、认识实体以及个体精神——西方的整个权力话语。在文学中,我们所有的一切关于作者、读者、阅读、写作、本文、流派、批评理论以及文学自身的思想突然间都遭到质疑。巴塞尔姆这样宣称:“我的歌中之歌是不确定原则。”[3](P200)他的《白雪公主》在叙事结构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均体现了这种不确定性。

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曾借助荷马史诗《奥德赛》的结构创作了《尤利西斯》这一不朽的现代神话。如今巴塞尔姆借用了白雪公主这一神话题材,但他在小说叙事结构上却自觉防止他的观察走向任何程度上的严肃的神话性。原始的神话结构在他的小说中被嘲弄、戏仿并转化。《白雪公主》的创作表明,语言和现实的状况已使模仿神话的手法再无立足之地。巴塞尔姆不再依靠常规性的小说手法:冲突、发展和线性情节,而是为读者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零碎片断,创造一种拼贴效果。他认为,“片断是我信赖的唯一形式”[4](P11),而片断的实质是支离破碎,因此,他的小说是拼贴小说,装配艺术,碎片组合而成的本文。

巴塞尔姆主要依靠并置,创造了一幅文字上的拼贴画。为了加强这种拼贴效果,印刷字体在常规字和巨大的大写黑体字之间来回变换,这些似无声影片片头的大写黑体字似乎为行动提供了客观的或作者的视角。这样,小说本文不断被这类乏味而无关紧要的离题语所打断。如整齐地排列在中间的意义不连贯的词语目录:平静/大吃一惊/胜利/坛坛罐罐/达克斯/胡诌八扯 巴塞尔姆运用这些异质同构的学术和文字垃圾的混合体,并非促成任何逼真的模仿图形,而是以新的高超技艺卓越地再现出生活在美国60年代中期人们的一种感觉:现代社会的变化使任何神话中心都无法维持下去,神话因素只能追踪至某种程度,然后就会遇到相应的替代物。

小说的不确定性不仅表现在叙事结构上,还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小说中的人物是对他们原型的戏仿,所有人物都是扁平性的,读者很难辨认他们的实际身份,因为小说中既缺乏与人物有关的历史或背景信息,又忽略了使动作具有真实感的任何种类的细节。作者只交待了这七位侏儒出生于各种各样的国家森林,而没有对任何人物的任何形体描述和人物背景提示以及任何个人癖好特点。有时就连侏儒们彼此间似乎也难辨认。他们的生活表现出社会常有的嫉妒、陈辞滥调的见解、心理苦恼和语言怪癖。他们荒诞不经,与原始神话所让他们扮演的无知无觉的、无私的角色不相称。

与侏儒们相比，保罗与原角色更不相同。他的王子式使命是把白雪公主从侏儒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使她免遭简的蓄意谋害。但他明白当今社会的状况敌视真正的王子性，缺乏英雄行为的机会，使他应该扮演的原型无法得以维系。从小说一开始，他就对白雪公主的出现给他本人的生活带来的预示表示忧虑。他没有把握圆满履行她的牵涉会给他施加的义务和责任。他躲在西内毕达的一家修道院，回避他的王子式使命。他去法国和罗马巡游回来后，决定不再逃避作为王子的义务了。但他像许多现代文学所塑造的反英雄一样，无法对任何境遇作出自然的反应，文学和文化惯例已使他丧失了决策能力，他只能踌躇、周旋于他的反应之中。在危机关头，笨拙的保罗喝了简给白雪公主准备的毒酒而死。保罗这一形象表明，现实再也不能维系“贵族血统”、“王子性”和“王子行为”这样的价值标准，再也不能创造英雄形象或为童话创造恰当的结尾。

零散性与无我性 美国当代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对后现代主义零散性、无我性和无深度性特征做了深刻阐述。[2] (P240-241) 零散性与无我性指的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主体的消失。主体作为现代哲学的元话语，标志着人的中心地位和为万物立法的特权。然而，在后现代主义中，主体丧失了中心地位，已经零散化，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了。“我”这一概念，也仅仅成为语言所构成的影像。语言及其社会性赋予人一个“自我”的概念，这一概念只是像镜子提供给人一个映像而已。另一方面，后现代人在紧张的工作后，体力消耗得干干净净，人完全垮了，这是一种非我的“耗尽(burn-out)”状态。这时，那种现代主义多余人的焦虑没有了立身之地，剩下的是后现代式的自我身心肢解式的零散化。在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耗尽”里，人体验的不是完整的世界和自我，体验的是一个变了形的外部世界和一个类似“吸毒”一般幻游者的“非我”。人没有了自己的存在，人是一个已经非中心化了的主体，无法感知自己与现实的切实联系，无法将此刻和历史乃至未来相依存，无法使自己统一起来。这是一个没有中心的自我，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自我。

随着主体的丧失，随着支配观点的意识的丧失，失去行为统一性或人物统一性的小说，变成了“无情节”的小说，一种感知的麻木。主体零散成碎片以后，以人为中心的视点被打破，主观感性被消弥，主体意向性自身被悬搁。世界已不是人与物的世界，而是物与物的世界。人的能动性 and 创造性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纯客观的表现物，没有一星半点情感、情思、也没有任何表现的热情。在《白雪公主》给读者所展示的后现代世界里，人成为没有身份的自我，失去行为的统一性，表现出一种感知的麻木。白雪公主已不再是童话中那个令人疼爱的白雪公主，侏儒也不再是童话中那七个无私、善良，以照顾、保护白雪公主为己任的小矮人了。

白雪公主已厌倦“家庭主妇”的身份，于是不再安分守己，将她黑如乌木的头发从窗口垂下去，“好让凡夫俗子大吃一惊，让自己的爱欲生活焕然一新”。然而，后现代世界中的人们却给了她巨大的遗憾。人们对头发的反应竟是如此的麻木：两个失业的老头迫于生计，只好把对头发的粗暴的“吻”留给保罗式的人物；总统对头发并不满意，因为他有更多的事儿要操心；摇滚乐队的头儿只是对野牛音乐感兴趣，对头发只是看一眼；比尔认为白雪公主的这个举动“意味着她只不过是一个他妈的堕落者”；而白雪公主苦苦期待的保罗却受社会状况所制约，也没有爬上去扮演王子的角色。白雪公主意识到，她错误地高估了保罗，高估了历史。整部小说，没有情节，只是如前文所说的不能整合的零碎的片断；也没有人的精神与个性，正如米歇尔·福科(Michel Foucault)所认为的那样：“‘主体’让位于系统或结构，主观性被客观性所取代，‘人’消

亡了”。[2] (P153)

无深度性 无深度性指作品审美意义深度的消失。后现代主义作品不再提供任何现代主义经典作品所具有的意义。现代主义大师如普鲁斯特、里尔克或乔伊斯的作品要求读者深入其意义深渊之中,通过不断地阐释和发掘,获得审美的意义。而后现代主义却拒绝解释。作品的意义不需要寻找,书的意义就是书的一部分,没有所谓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所谓深层意义。作品不可解释,只能体验。它提供给人们的只是在时间上分离的阅读经验,无法在解释的意义进行分析,书的意义在不断阅读的陶醉中。

小说《白雪公主》一开始就交待说,“比尔开始厌倦白雪公主,但是他不能告诉她。”读者不必去问为什么,因为小说接着就告诉读者,比尔受不了别人触摸他,无论谁触着他,他都难以忍受,这是因为他不愿再跟人打交道,这是一种撤退,“应付焦虑的四种模式之一”。这种叙述削平了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对现象与本质区分的深度模式。白雪公主渴望着他的“王子会到来”,读者无须去探究白雪公主的深层心理,因为作者直接了当地告诉读者,她已厌倦与只等于两个真正男人的七个侏儒在一起的生活,她希望“自己的爱欲生活焕然一新”,“从窗口跳出来,去跟保罗睡在他的洞穴里”。这样就削平了弗洛伊德的表层——深层的心理分析模式。后现代主义彻底抛弃了表层下面的深层压抑的说法。

比尔主张将“痛苦不堪”的情感表达出来,人就能得到解脱。比尔的思想行为表明,后现代人已经不再为生活的荒诞和精神的危机感到焦虑,他们是在对环境的接受中变得麻木不仁。这里,存在主义关于真实性与非真实性,异化与非异化的二项对立的深度模式被削平。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拒斥所谓可以从非真实性下面找到真实性的说法,并宣布“异化”这一概念值得怀疑。

《白雪公主》中有许多失掉方向而滑入纯粹不着边际之语,漫无章法地跑到“纯粹胡诌八扯”的领域,表明语言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例如比尔的侏儒伙伴们关于比尔的讨论。他们谈到他的衣服,谈着谈着,这番明显的离题话就变成了一个漫无章法的文字垃圾堆:“比尔的僧布棕色新睡衣下个月就该到了,是保罗给他做的。我们用在宝贝丁三刀里的猪耳朵没有达到美国政府的等级标准,或者说,实际上没达到任何标准……英镑疲软。母牛在产小牛犊。仙人掌需要浇水。新楼房正在建设中,已有45%的可租空间被租出。明天的天气,晴,转暖。”作者让侏儒丹说出的这种不着边际之语取消了索绪尔符号学对立的能指与所指的区分,没有概念,只剩下语音形象,从而也取消了深度。总之,后现代主义消除现象与本质、表层与深层、真实与非真实、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立,从本质走向现象,从深层走向表层,从真实走向非真实,从所指走向能指。

非原则性 非原则性即对一切准则和权威的“合法性”加以消解。法国著名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Jean-Francois Lyotard)的意见是,既定的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非合法化”,消解元叙事(metanarrative)和堂皇叙事(grand narrative),而偏好保留了语言游戏异质性的“小型叙事(petit recit)”。[2] (P258~259)换言之,那种以单一的标准去裁定所有差异进而统一所有的话语的“元叙事”已被瓦解,自由解放和追求真理的“两大合法性神话”或两套“堂皇叙事”已消逝。[2] (185-189)

后现代的特殊透视角度的“解合法化(delegitimation)”和对“元话语”的质疑。在后现代境况下,元话语那套合法性装置已然过时,堂皇叙事的社会语境:英雄圣贤、拯救解放、伟大胜利、

壮丽远景等，全都因社会背景的变故而散入叙事语言的迷雾中，人们不再相信政治和历史的言论，或历史上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的“主题”，取而代之的是“小型叙事”。英雄时代（英雄、救赎、远景）已经过去，后现代是一个“凡人”的世界，是一个只重过程而不重结果的时代。这个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学术网络已经分化为繁杂细微的学科，各种不同学术范式之间的界限消失，于是后现代“大道”展示出来：科学只能玩着自己的语言游戏，传统社会范式在语言游戏的“播撒”^{[4] (P32)}下，濒临瓦解；任何人都无法用科学来判定其他语言游戏的合法性，科学自己也无法使自己合法化。

在《白雪公主》中，巴塞尔姆借侏儒比尔之口说出对后现代语言的主张：“给我古里古怪的语言：故意捣乱、结结巴巴、嗑嗑绊绊，我就心满意足了。”巴塞尔姆在《白雪公主》中对元叙事的瓦解见于以下三种情况：小说中破碎而不完整思想和句子尽力想使自己有真实感，却只能表现为完整的、打破句法规则的、用巨大的大写黑体字表示的片断；不完整的思想有时还用无标点符号的碎片式句子表达；小说结尾是用没有标点符号和巨大的大写黑体字表示的标题式的上下排列的句子构成的：白雪公主的屁股失败/白雪公主再度贞节/白雪公主崇拜/白雪公主升天/主人公出发去寻找/一个新的信条/嗨嗨 巴塞尔姆就是运用类似这样的语言游戏异质性的小型叙事消解了传统的元叙事。

同时，巴塞尔姆以对保罗这一反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宣告堂皇叙事的无效。白雪公主将黑发垂在窗外，期望着一位王子来将她救出。可是，后现代的状况决定有着尊贵的王室血统的保罗不能履行他作为王子角色所应履行的职责，只能喝了毒酒而身亡告终。白雪公主早已意识到：“我生活在一个错误的时代。……这个世界本身也出了毛病，因为它提供不出一位王子。”这是一个“凡人”的世界，他们对那种没有英雄壮举的生活过程感到满足。七个侏儒怀恋没有白雪公主前的平静生活，他们不加思索地做他们正在做的事。他们讨厌有了白雪公主之后复杂的生活，他们整日茫然不知所措。在这个世界里，白雪公主也矛盾重重，闷闷不乐。她宁愿被那七个男人留在森林里，而且就在那里丧生，现在就不会在这儿思考了。在这个世界里，既没有富于激进的政治性、注重人文独立解放的思考模式，也没有注重同一性、整体性价值的思维模式。人们的生活是以空虚、无目的、失望、失败为主要特征。

卑琐性 非原则化导致了价值倒置，规范瓦解，视点位移。这种变化在艺术上表征为表现“卑琐”。后现代在消逝神性以后的飞地上将人自身那见不得人的卑微性展示出来，再现了一个充满恐怖和卑琐的世界。如《白雪公主》中，在这个没有“英雄”的后现代，保罗的父亲，虽是一个最具君王风范的男人和人物，他的风度和优雅不过是在50岁时还往他的鞋里喷科隆香水，他最大的雄心是时不时扑倒清理卧房的临时女仆；“有更高尚的雄心”的保罗却惧怕责任与义务，最终也未能完成自己的王子使命。简因自己的美丽不复存在，“男人们从大老远跑来，就是为了听我随意支使”的“那些不错的日子”如今已一去不返，便培养她的恶毒，欲毒死美丽的白雪公主；霍果欲得到白雪公主，因没有王室血统，遭到白雪公主拒绝，便考虑如何把有王侯之身的保罗“一次了结，永远了结”地干掉。他们代表着人类卑微和邪恶的一面。

不可表现性 后现代主义反现实、反偶像崇拜，拒斥模仿，力图寻找边缘（即总是寻找非中心、非典型性），接受“衰竭”，以有声的沉默瓦解自己。它变得有限了，因为它同自己的表现形式以及同一切崇高的东西相比较量。它不断创新，在消解元叙事和堂皇叙事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消解自己。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就是一部这样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下转第48页）

部浓缩置换到“色彩——笔触”这对绘画而言最本质的物质上。它既要有造型的功能,还要有赋彩的功能和统一协调的功能。最终还得落实到传达画家思想、情感与气质的功能上,可见是何等之难事!

塞尚的作品多数呈“未完成”状态,而且时间跨度长达数年之久。这当中“难”固然是原因,但似乎也说明塞尚与其看重的是绘画的结果,莫如说更看重的是绘画的“实现”、“调节”的过程。从他的画中,我们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娴熟与精妙,但却能清楚地看出画家实验、探索的全过程,可以明显感受到画家思索的轨迹和“试仿”的不懈努力。这标志着画家以其特有的方式进行着关于“真实”的哲学探讨,在分析自然的同时也在分析着人类自身。在穷究自然的同时也在穷究着人类本身,因此,塞尚的绘画势必与以“镜子说”为核心的传统绘画在本质上拉开距离,以其实践性、探索性、彻底性为现代绘画开辟了无限的前景。

参考文献:

- [1] [日] 渡边康子. 现代世界美术全集—塞尚[M]. 东京: 株式会社讲谈社, 1980
- [2] [法] 约翰·利伏尔德. 塞尚传[M]. 郑彭年译.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7.
- [3] [德] 瓦尔特·赫斯. 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M]. 宗日华译.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0

[责任编辑: 邵青莲]

(上接第 42 页)它表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即在这没有英雄、也不会有英雄的时代里,在这空虚无聊、浑浑噩噩并充满失败、卑琐与恐怖的现实生活中,人“已经失望了,无疑还会更加失望。彻底失望”。在艺术创作上,作者运用小型叙事,戏仿所有名作家用过的文体和方法,蓄意制造支离破碎的语言,目的在于消解一切既定模式。如果后现代主义以不断创新的精神再把“小型叙事”也消解了,文学就真地如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之一约翰·巴思(John Barth)所说:“形式已被用完,某些可能性已被穷尽”。[5] (P71)然而,“你必须穷尽所有这些可能性”,[5] (P84)继续写“失望”、“失败”,展示“卑琐”,同时以“穷尽”为题材和技巧来创作出别出心裁的作品,目的只在于延续写作活动。无论是从内容上看还是从形式上看,后现代主义都表现出当代的写作危机和它自身的不可表现性。

参考文献:

- [1] [美] 兰斯·奥尔森. 杂七杂八: 或介绍唐纳德·巴塞尔姆的几点按语[A]. 周荣胜, 王柏华译.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1994.
- [2] 王岳川. 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3] [美] 奥哈拉. 唐纳德·巴塞尔姆: 小说的艺术[J]. 巴黎评论第 80 期(1981 年夏季号).
- [4] [法] Jacques Derrida, *Dissemina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1.
- [5] [美] John Barth. “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 (1967) in *The Novel Today*, ed. Malcolm Bradbury. Fontana Press 1990.

[责任编辑: 邵青莲]